

[德] 马克斯·韦伯著

学术生涯 与政治生涯

——对大学生的两篇演讲

王容芬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

——对大学生的两篇讲演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王 容 芬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一九八八年·北京

011/2 102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6. Auflage

(1985)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4. Auflage

(1980)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根据联邦德国莫尔出版社 1985 年版《马克斯·韦伯科学论文集》第 583~613 页和 1980 年版《马克斯·韦伯政治论文集》第 505~560 页译出。

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

——对大学生的两篇演讲

〔德〕马克斯·韦伯 著

王容芬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25 印张 11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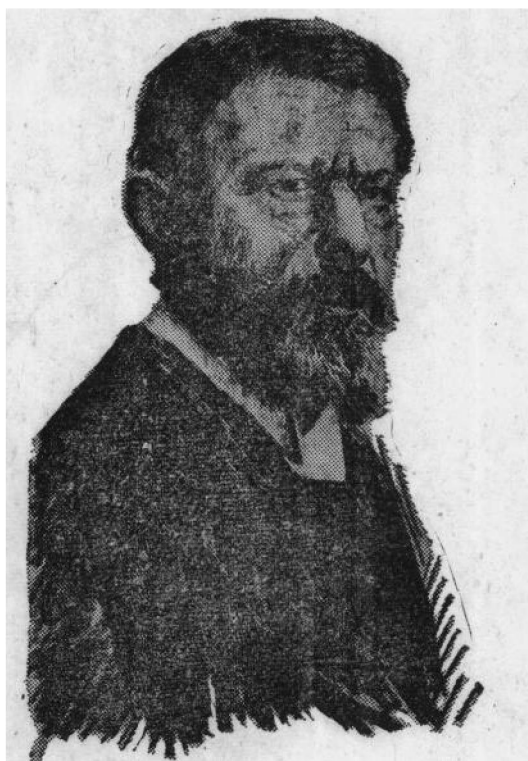
1988 年 9 月第 1 版 198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049-148-X, C·19

定价：1.45 元

译者的话

本书收录了韦伯去世前不久为慕尼黑大学的同学们做的两篇重要演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韦伯以一位严肃的学者和政治家的身分，科学地、入微入细地讲述了一个正直的学者必须具备的道德和一个诚实、热忱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职业的伦理。演讲充满理性主义的教诲，启迪过本世纪三代伟大的学者和政治家，例如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豪斯、美国社会学领袖帕森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豪克海默尔、荣获 300 多项学术奖的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哈贝马斯等人。韦伯两篇演讲的理性主义的魅力经久不衰、历久而弥珍，今天被列为西方大学生的必读物。书前所附作者小传，描述了韦伯本人的学术生涯和政治生涯以及他的学生时代、婚姻、爱情、疾病、奋争，可使读者对这位被封禁了 40 年之久的外国学者的境界略知一二。书后附有当代韦学权威对两篇演讲的评价，还有本书译者的一篇考察报告——“联邦德国的韦伯复兴运动”以及一位德国韦学家对中国韦伯热的评述。你想献身于学术或政治吗？你想知道一代大师马克思·韦伯吗？你想知道西方的韦伯热和中国的韦伯研究吗？这本小册子会成为你的益友。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年4月21日生于德国埃尔富特，杰出的思想家，在政治学、法学、史学、社会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及社会科学方法论诸方面都有创新的贡献，他对欧、亚文化现象所做的跨学科的历史比较，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成果之一，1920年6月24日歿于慕尼黑。

目 录

作者小传.....	王容芬 (1)
以学术为业	M · 韦 伯 (15)
以政治为业	M · 韦 伯 (49)
附录:	
《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特色	W · 施鲁赫特 (109)
联邦德国的韦伯复兴运动	王容芬 (1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韦伯的接受	P · 科隆科 (155)

作者小传

1918年，刚刚逃离人祸的欧洲人，又摊上了天灾：一场史无前例的流行性感冒席卷了大陆。死于这场瘟疫的人数，据说超过了前4年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我们不幸的作者赶上了瘟疫的余威，1920年夏初，韦伯病倒了，持续高烧不退，一周后，转为肺炎，医生束手无策，如同今天面对一位癌症晚期病人一样。6月14日，星期一，黄昏，经过痛苦的挣扎，韦伯溘然长逝了。那间房子在慕尼黑英国公园旁边的湖街3号，今天改成了16号。他去时，外面下着雷雨，道道闪电划破昏暗，照亮了他的归程。亲人把他送回海德堡，让他安息在心爱的山水之间。

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永远失去了一位睿智的良师。他原来答应下学期为他们开社会主义课，可是却匆匆去了……他的音容笑貌犹在，几个月前，他还应学生会邀请，做了两次演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他的演讲和他的课的震撼力，象他本人一样深沉，而他却看不到了。一位姓温克尔曼的学生，自从听了韦伯的演讲，就迷上了韦伯的思想，他用了60多年的时间研究、整理、阐释、出版韦伯的著作。在他以85岁高龄辞世时，终于带着韦伯全集出版委员会成立的佳音去告慰67年前的演讲导师了。一位姓豪斯的学生，后来成

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他回忆导师的演讲时说：“他的演讲，严肃中带有威慑，对虚伪的强大和赤裸裸的装腔作势进行了无情的挖苦，并从教育上简化了难题，因而确有震撼力。”^①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之父的豪克海默尔站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评价了当年听到的韦伯的课：“1919年，我作为一名大学生在慕尼黑听到了韦伯讲的价值无涉。象我的许多同学一样，我对了解俄国革命兴趣极深……而马克斯·韦伯在他讲课时谈了苏维埃制度。大厅爆满，可是韦伯显然使人失望了。他没有谈及不仅在提出任务时，而且应当在每一具体步骤中由理性地塑造未来的思想指导反映与分析，我们在两三个钟头里听到的是对俄国体制的缜密的字斟句酌的解说，对使苏维埃制度尽可能确定下来的洞若观火的理念型的归纳。一切是这样入微入细，这样科学，这样价值无涉，结果，我们只好伤心地回家去……当我们如此失望地离开大厅时，我们想，马克斯·韦伯保守之极。可这结论下得太急了。不多久，韦伯在讲课时与……旧意识的保守学生、与学生会发生了冲突。我不在场，但认为，他的阐述就象他自己感觉到的那样，不总是那么价值无涉。”^②

当年韦伯的学生中，后来成为学界、政界栋梁之材的，不乏其人。带领他们攀登的导师却在正当年时倒下了。56岁，无论对于政治家，还是对于学者，都是弥足珍贵的年龄。凭着这个年龄，人们不仅可以收获半个世纪的耕耘，而且可以信心百倍地去攀登险峰、破出新境。当年，韦伯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的客观性》的结尾，引用过《浮士德》中的一节诗，表示

① H·N·菲根：《马克斯·韦伯》（1985年德文版）第137页。

② H·N·菲根：《马克斯·韦伯》（1985年德文版）第137页。

自己的心境：

“……新的动力已醒，
我继续急行，去痛饮它那永恒的光明，
面对白昼，背负黑夜，
头顶蓝天，脚踏浪峰。”

天假以年，韦伯的贡献将是不可估量的，单从他身后声名累增这一事实，就足以看出潜力之大了。他留下的遗憾太多了：《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只有《儒教与道教》定了稿，但韦伯又惴惴不安地说：“遗憾的是，身边没有一位汉学专家来检验我的工作。因此我顾虑重重，怀着极大的保留将这一部分也一并付印。”^①《印度教与佛教》未及审订。《古犹太教》还没写完，原来还打算进一步分析《旧约》中的诗篇并阐释犹太法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和《早期基督教》尚未动笔。《经济与社会》也只是个成功的半成品，韦伯 1913 年曾致函出版社：“我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并进行了描述，这套理论把伟大的共同体形式同经济联系了起来：从家庭、一幢住宅楼的全体居民到企业、宗族、民族共同体、宗教（包括地球上各大宗教：救世学说与宗教伦理社会学……），最后，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学的国家与统治学说。——我可以说：还没有过这样的理论，也没有‘榜样’可寻……”^②可是，他未及做完。他把人们领进了一片原始森林，却突然消失了。即使是满目荆棘，也远远胜过一具玲珑剔透的盆景、一座尽善尽美的花园。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韦伯这短促的一生是怎样走过来的吧！

① 《宗教社会学论文集》（1978 年德文版）第 1 卷第 278 页。

② 转引自 H·N·菲根，《马克斯·韦伯》（1985 年德文版）第 90 页。

马克斯·韦伯 1864 年 4 月 21 日生于德国图灵根的埃尔富特市，他是老大，下面还有 7 个弟妹。大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后来成了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韦伯的父亲是一位受过典型的德国大学教育的政治家，主办过《普鲁士周报》，当过柏林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柏林市议员、普鲁士议院议员、帝国国会议员。在政治上，他属于民族自由党左翼，信仰新教，但是个享乐主义者。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她把宗教不仅作为信仰，而且作为事业，晚年在夏洛特堡济贫处工作。

父亲在家里开了一个沙龙，常客中有史学家 H·V·特赖奇克、H·V·聚贝尔、Th. 蒙森、政论家 F·卡普、文学史家 J·施密特、议员老 H·李凯尔特、民族自由党的领袖 R·V·贝尼希森、财政部长霍普雷希特，还有法学家 L. 戈尔德施密特——有人称他是全世界最大的商法权威，韦伯后来当了他的博士生。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和政治精英，在韦伯眼里，是满天星斗中最亮的几颗。他很喜欢听这些大星星纵论天下大事，以至孩提时代的信中，就已经充满了政治术语。家里的精神激励他上进，他存储的知识远远超出了学校的要求，还能作为礼物送给别人，例如从历史图片、辞书、史书、旧家谱中搜集资料，然后写成文章或制成卡片作为圣诞礼物。

在信仰方面，他从小就接受了母亲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认为：“一个能够老老实实地说出他根本没有彼岸的信念和希望的人，只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幸的被造物。因为，对于生活不寄任何神圣的希望，不相信每一步都接近了彻底的解脱、最终结束存在的解脱，这在实际上只能是一种可怕的感觉，会使人失去任何生活希望。”^① 他踏上人生道路时得到的箴言是：

^① 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1984 年德文版）第 49 页。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①

韦伯自己写过一份简历，提到了他的学校生活：“……1882年复活节被保送入高等学校，先后上过海德堡大学、施特拉斯堡大学、柏林大学、格廷根大学……”^②

在海德堡，他以父亲为榜样，选择了法学为专业课，同时修国民经济学、史学、哲学和神学。离开了母亲的监护，迈入一个新的环境，他真有些眼花缭乱了。在父亲的鼓动下，他参加了当年父亲参加过的学生社团——决斗会。他酗酒无度，喝名酒上了瘾，啤酒当然更离不开。他每天早上都要到决斗场上去“锻炼意瘾”，给父亲的信也充满了时髦的粗话。父亲对此很欣赏，认为男子汉就应当这样。啤酒使韦伯发了福，剑伤让他破了相。暑假回家时，虔诚的母亲被儿子这副酷似其父的尊容吓呆了，不由自主地给了他一记耳光。30年后，韦伯指出，他脸上的标记是这个时期的产物，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从自己身上知道了，要把这些在不成熟的大学岁月中不自觉地练就的姿势从肢体上清除掉，是多么困难。我想说，喝酒也一样……”^③

1883年，他到施特拉斯堡服兵役，同时在施特拉斯堡大学听课。住在这里的姨父和姨妈成了他的第二父母，对他后来的生活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姨父赫尔曼·鲍姆加滕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史学家，施特拉斯堡大学的教授。他继承了德国1848年的革命精神，对俾斯麦不抱任何幻想，同时尖锐地批判

① 《新约全书·哥林多后书》第2章。

② J·温克尔曼：《马克思·韦伯的博士论文》，载《纪念马克思·韦伯》（1982年德文版）第12页。

③ 马克思·韦伯：《1876—1893年青年信札》（1936年德文版）第132页。

了当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自由主义，这同韦伯父亲的保守立场是对立的。姨父很快成了韦伯的良师益友，成为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姨妈同母亲一样，也是笃诚的新教徒，这种信仰是从她们的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姨妈同韦伯的父亲在生活方式上水火不相容，对妹夫那种游戏人间的态度嗤之以鼻。她对妹妹和外甥很有影响。韦伯逐渐看出，原先奉为楷模的父亲，不仅政治上保守，而且生活上也是个不堪为人师表的享乐之徒。父子冲突后来发展到不可收拾，截然分手，分手后不久，老韦伯便抑郁地死去了。

1884年，韦伯回柏林继续上大学，主修法学，并听蒙森和特赖奇克的历史课。由于受鲍家姨父的影响，他反对特赖奇克那种过激的爱国主义，认为他是典型的教授煽动家。这期间，他常给姨父写信，谈他的政治见解。他在同代人中看到了大有希望的一代在成长：“他们中间无疑有不少妄自尊大之徒……许多人受特赖奇克的影响，陷入魔幻般的民族狂热之中，还有一些人……接受了最新学派的假现实主义……但是，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人，抛弃了反犹主义及其近年来的变种，立足点完全不同于70年代的民族自由主义。我越来越相信，他们是自知自强之士，因而也是未来的主宰……”^①

下一学年，他到格廷根继续修法学，目的是在那里参加法学课的全国统考。毕业后他又回到了柏林大学，当上了戈尔德施密特的博士生。在准备论文期间，他到波兹南参加了国家规定的军事训练，借此机会，跟着诺劳县长考察了东部边境地区。在他眼里，德意志-斯拉夫边界成了一条文化和民族的

① 马克斯·韦伯：《1876—1893年青年信札》（1936年德文版）第298页。

边界，在这条边界上孕育着外来影响过多的危险，二次大战以后的政治现实竟让这位未出茅庐的博士生不幸而言中了。1889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题目是《源于意大利城市的家庭工业联合体的无限商业公司的连带责任原则及专有财产的发展》。这篇论文资料翔实，作者查阅了几百份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的原始资料，立论严谨，导师给的成绩是“优”。同一年，韦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著名的《中世纪商业公司史·根据南欧资料》。

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他接着准备教授论文，这期间他在柏林当律师，参加了“新教与社会大会”，结识了P·格勒和F·瑞曼，成为莫逆之交。早在准备博士论文期间，他就加入了“社会政策协会”，现在受协会委托，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工人调查”。他设计了问卷，发放了3180份，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易北河以东农业工人的状况，特别是他们同地主的关系。指出农业工人问题的关键是：能否为他们腾出向上的空间，为他们提供独立生存的提高机会。否则，农业工人会大批外流。而代替德国工人的波兰流动工人更能适应这种生存条件，这支游动大军春天越过边界过来，冬天又搬走了。不仅农业工人，德国小农也清理了田地，转让给知足的波兰人。韦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见解：不适者生存，或弱者生存。当年的波兰流动工人是这样，今天西欧各国那些文化和技术水平都远比本国工人低的外籍工人也是这样。即使北京上海那些来自安徽最穷的县的保姆，似乎也用她们的生存证实了韦伯的命题。1892年，他完成了教授论文《罗马农业史》、《公法和私法的意义》，开始为患病的戈尔德施密特在柏林大学代课，讲授商业史和罗马法律史，次年被聘为柏林大学商法教授，同时被

推荐为弗顿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年 29 岁,这一年,他和倾心于他的玛丽安妮结了婚。这位朴实无华的妻子在韦伯的一生中给了他巨大的帮助,尤其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1894 年,他到弗顿堡大学就职。次年 5 月做了题为《民族国家与国民经济政策》的学术就职演说。他利用这个机会,向当时国民经济学里的各个学派发起了进攻,既反对施穆勒式的伦理与文化倾向的国民经济学,也反对天真的讲坛社会主义的幸福论,指责他们把事实描述与价值评估稀里糊涂地搅在一起。他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在国民经济学方面的根本观点:“作为解释与分析科学的国民经济学说是**国际性的**,只要它作出**价值判断**,就会打上在我们自己的本质中能够找到的人性的烙印。如果我们自认为脱离了自己的体肤。这种烙印就更加明显。用一幅带点幻意的画面来描述:当几千年后我们从坟墓中走出来时,这些就会成为我们在未来人的面目中研究的我们的本质的遥远的痕迹……

因此,德国的国民经济政策和德国国民经济理论家的价值尺度一样,只能是德国的。”①

他也开诚布公地亮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权力斗争说到底也是经济发展过程,是民族的权力利益,这种利益在引起争议时,是**终极的**决定性的利益……关于国民经济政策的科学是一门政治科学。它是民族的持久的权力政治利益之什……**民族国家是……**民族的世俗权力组织,而在这个民族国家中,对于我们来说,即使从国民经济的角度来看,终极价值尺度也是‘**国家至上原则**’。”②

① 马克思·韦伯:《政治论文集》(1980 年德文版)第 13 页。

② 马克思·韦伯:《政治论文集》(1980 年德文版)第 14 页。

就职演说引起的震惊远远超出了学术界和演说人所处的时代。韦伯本人后来也发现，这次演说使人对他的观点之粗野大为震惊。

1896年，韦伯到海德堡大学接替了历史学派的领袖克尼斯的国民经济学教席。这一年夏天，同他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矛盾都很深的父亲去世了。突然失去了生活中已经习惯了的对立面，韦伯的心灵中出现了空白。秋天，他患了神经衰竭症，一天重似一天，拖了好几年。韦伯因不能工作而感到负疚，在1903年，他39岁时，永远辞去了教授职务，其实这时健康已经有了转机。

在韦伯患病的六七年间，玛丽安妮履行了一个忠实的妻子的职责，她一直陪伴着他到各地疗养，象照料小孩子一样看护着这位精神病患者。1903年9月3日，是他们结婚1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他们适逢两地，因此有了下面动人的两地书：

丈夫：“咱们今天还象当年那样天真，只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灵魂中发现了许多更可靠的东西。我今天怀着感激回首那些艰难、紧张、不无精神危险的岁月……”^①

妻子：“回首10年，充满了爱，共同的上进和沉重的命运。如果咱们不是在最近5年中如此相依为命的话，咱们的共同生活大概不会变得如此深刻和富有，我经常想象，命运把咱们抛到了一个荒岛上，一切有生命的世界的任何别的声音都淹没在命运那无休止的波涛中。友人和亲人又怎能帮助我们呢！我们只能自己承受它，自己战胜它。我想，正因为这样，咱们才息息相关，永不可分，别无它择，大概只有少数夫妻能做到

① 玛丽安妮·韦伯：《韦伯传》第280页。

这一点。而这正是我平生的愿望之一，我最大的愿望——我当然从没有想过，要以你的病为代价来实现这个愿望，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爱给了我们力量，去正视这样的命运，咱们没有在命运面前变得萎萎缩缩、怨天尤人。我希望，咱们能够继续承受，怀着希望、期待和爱。”^①

健康危机过去后，他开始从事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并和友人一起办《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杂志。这期间，他去过美国，收集了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和1906年，是他工作非常紧张的两年，除了两篇新教论文，他还写了《关于俄国1905年革命》的长篇论文。他欢迎这场革命，希望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思想自由化。他还领导了《社会政策协会》里少壮派对保守权威的斗争、在社会民主党的大会上批评该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和错误的纲领、对高等学校的政策问题发表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1908年，韦伯着手写《经济与社会》。这一年，国际哲学家大会在海德堡举行。新组建的海德堡科学院决定授予韦伯“特别院士”的资格。但他拒绝接受这一荣誉，理由是，这个机构把大批年轻有为但名气不大的学者拒之门外。他打算筹建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既从事理论研究，也从事经验调查的学术组织。1909年1月，他在柏林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创建了德国社会学学会，并出任司库，会长是F·滕尼斯，副会长是G·齐美尔和H·海尔克纳（不久由W·桑巴特代替）。学会一直存在至今，在德国科学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难能

^① 玛丽安妮·韦伯：《韦伯传》第280—281页。

可贵的是，在纳粹统治时期，学会没有接纳过一个纳粹党徒，没有出现一个希特勒的追随者。

1911年，韦伯开始写《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这是一项大规模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从整体上看，是对以前的新教研究的补充和侧证。韦伯试图通过对各民族发展史的综合考察，说明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只出现于西方。于是，资本主义课题又被提高为理性主义课题，变成了东西方理性主义的比较研究。战争使这项研究一度中断，他以预备军官的身分入伍服役，担任野战医院的惩戒官。但他很快就辞职退役，继续进行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1916年发表了《导论》、《儒教 I——IV》、《过渡研究》、《印度教与佛教 I——III》。1917年发表了《古犹太教 I》

1917年，韦伯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社会学与经济科学中“价值无涉”的含义》。文章捍卫了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几乎成为众矢之的的“价值无涉”原则。所谓“价值无涉”，就是研究人员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带任何主观的价值观，不能混淆“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韦伯甚至反对大学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们提出政治要求。在德国，“价值无涉”论战持续了几十年，到了1964年纪念韦伯诞生100周年的大会上，这个课题又被美国来的一对水火不相容的学者帕森斯和马尔库塞当成了论战课题。

韦伯反对在学术中渗进政治价值，但是，他却以学者的身分积极干预了德国政治。他看到了威廉帝国政治上的无能以及同人民的深刻矛盾，主张把现政权作为人民的国家机器，主张修改宪法，实行议会制。他为《法兰克福报》写了份宪法草案，因此被普鲁士政府斥为“大逆不道”。在对外政策上，他